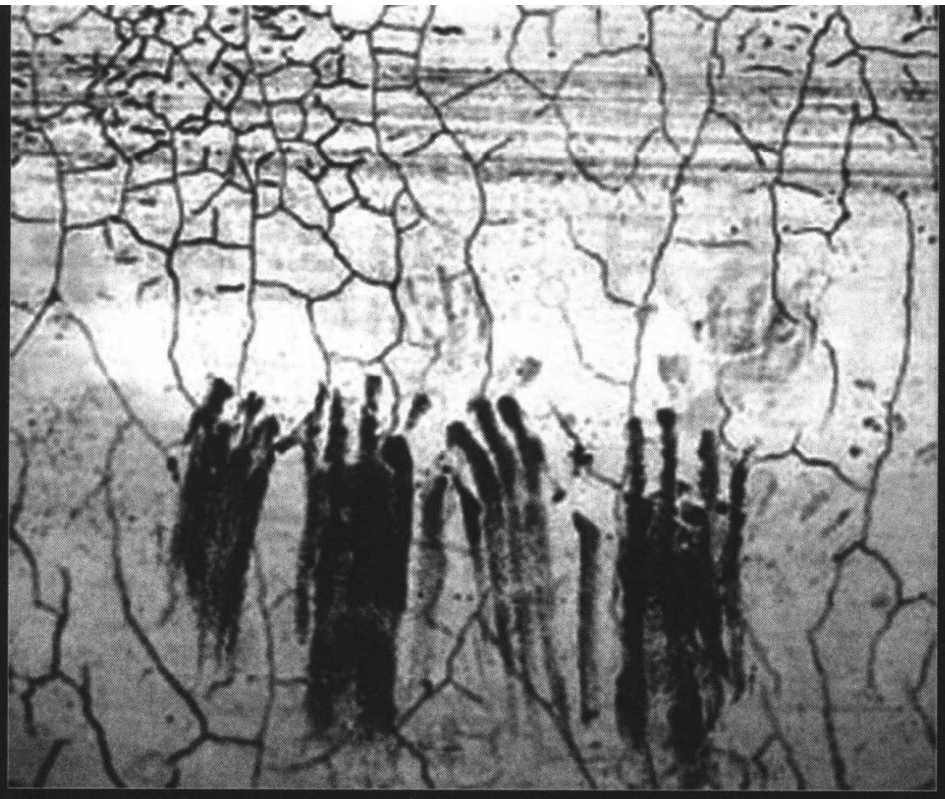


2005年6月10日

2005年6月10日，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沙兰河突发洪水，导致沙兰镇中心小学百余名学生死亡。尽管有关部门及时而高效地做了大量的善后工作，仍然无法使沙兰镇的一大丛含苞待放的花朵免于凋零！

痛定思痛，我们不免要因此回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来：自然灾害是完全不可抗的吗？它与生态环境以至人文生态有没有关系？我们应当如何善待这种关系？

关于这次灾难性事件，这里选载了三篇文章。作者都是传媒工作者，敏于世事，一意求真；而心系弱势群体，发而为文，尤属难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六月。沙兰镇手记

李海鹏

6月 15 日星期三，最后截稿日，上午摄影记者发回图片，下午我发回文稿。

6月 13 日下午 5时左右我们到达沙兰镇外的救援指挥部，经登记，获得采访资格。当日在镇上采访至晚 10 点左右，回宁安市。14 日早 8点 30 出发，在宁安市殡仪馆和沙兰镇不间断采访，至晚 11 时回牡丹江。此前在 11 日下午及晚上，还有 10 个小时左右用于收集当地气象、水文和其它资料。这一工作量，在当时条件下也算不少，因此我相信自己获得的信息的数量。另外我也相信这些信息的质量，因为我相信眼睛，多过相信耳朵。

村民们说得很清楚，我也看得很清楚，来水只有一个方向，就是沙兰河。我们的出租车在 6月 14 日打了 680 多块钱，除了在往来的公路上花了大约 300 多块钱之外，就是在沙兰镇转来转去，没看到任何其它方向来水的迹象。一个必须注意的客观事实是，山很远。常识是，水往低处流。哪里最低？河流和湖泊所在地最低。如果距离够远的话，山上下来的洪水一定会先汇入河流。

14 日，我们两次试图去上游的王家村、和胜村以及和胜水库，但是道路阻断，至当晚仍不能通行，因此无法判断上游几个村的情况。我只能说，在上游，山洪和泥石流也许有，也许没有。可是我们必须弄清楚一点，对于沙兰镇本地来说，人们遭遇的东西简单明了，就是河水出槽。

洪水至沙兰镇，即水到中心桥，约在 2点 15分。按受访孩子所述时间平均计算，从水进教室，到涨至 2米多高即最高水位，大约用了 10 分钟。另外，中间还有水漫中心桥、出槽、顺路流至操场以及冲垮学校围墙的时间，无人见证，我模糊计为 5分钟。也就是说，最高水位出现在 2点 30 分。

3点多一点儿，赵南日等家长已经可以冲进校园，当时水位是至胸，不超过 1米 2。也就是说，洪水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退却了将近一半。

这是什么样的洪水？没错，它可以杀人，甚至再小一些也可以杀人，但是不能回避的客观事实是，它的规模绝对不大。如果河道设施合理一点，即便洪水不能完全疏导，又如何能在短时间内杀死 100 多个孩子？

由于当时无法到达上游的几个村，因此我们无法判断上游的河道设施是否有拦水、蓄水情况，不过沙兰镇的情况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报道中已经写到，中心小学附近的中心桥的桥面距水面有 10米左右，而下游的这座矮桥桥面与水面的距离不超过 5 米。这座已被村民们称为“憋水桥”的矮桥受损严重，铁栏杆已经被彻底冲垮，显然承受过巨大的冲击。相比之下，学校附近的中心桥则毫发无损。正是下游的这座矮桥，起到了拦水坝的作用，使学校成为蓄水池。

我怀疑“200 年一遇的强降雨”的说法。

这一点我没有证据。同事徐彬在北京做了全天努力，联络气象专家，综合解析黑龙江省水文局的说法，以及我们查到的与之似有矛盾的中央气象台气象报告。

我们和上海电视台的女记者闯进了宁安市殡仪馆的几间停尸间，查到 24 个孩子和 4 个成人，记录了他们的名字。每个金属冰柜放两个孩子，一颠一倒。

更多的冰柜放在殡仪馆的车库里，进不去，我们在窗外查数，视线里重叠的很多，查不清楚。遇难者家属代表突然变卦，不再提供遇难者名单。

到 14 日，失去孩子的父母仍旧悲伤不已，可是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亲属们已经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赔偿款上面。这是灾难过后的典型场景，太熟悉了。我们生活在处处模仿现代西方的城市里，可是村民们的亲戚还是巴尔扎克时代的亲戚。一个死去孩子的叔叔让我帮他谋划如何向政府要更多的钱，接着说要帮我们一个大忙。蹭了一段儿车，然后就消失了。

这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伦理亲情，我们生活其间的现实生态。当然，更多的是纯粹的痛苦，报道中已有记述。

在沙兰镇，当时我们曾经答应村民，尽量说真话。我们会尽力的。当时在那里采访的记者有几百人，如果有一天再去沙兰镇，希望我们都能问心无愧。

罗伯特·潘·沃伦有句诗说：上帝爱世界，因它之所是。昨天我不爱这个世界，而今天我能爱这个世界一刻，区别仅仅在于自己是否努力过。

作者简历：李海鹏，1972年生，南方周末新闻部记者。现居北京。

沉 沦

祝大同

2005年6月10日星期五下午2点半左右，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沙兰河上游山区突降暴雨，瞬间形成洪峰，裹挟着泥沙，汹涌而下，位于沙兰河河湾低洼处的沙兰中心小学进水，沙兰中心小学有学前班和一到六年级，12个班，352名学生，31名老师。新华网当天晚上7点报道已有20余名学生下落不明。法新社则引述当地一家医院的医生的话，指出事件最少已造成50至60人死亡。沙兰即为悲情笼罩，这些年幼的孩子，这些尚还挂着露水的蓓蕾，刚刚含苞，更未绽放，却已凋零，死神在猝然间摄取了他们一个个天真的灵魂。

而在前一天，6月9日下午，我们山西汾阳昌宁宫村发生爆炸，一栋二层小楼夷为平地，周边5户26间民宅被毁。10日已知死亡9人，另有25名伤员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两名重伤。

10日一早，我出差去山西北路公务，上午到忻州、原平两地，下午到朔州，晚上住平朔露天煤矿度假村，这里曾经是中外合资时期外籍职员的独栋住宅，外资撤走以后，这些住宅便改造为对外营业的宾馆。同好尽地主之谊，4个人的晚饭倒也精致简单，没有人喝酒，食量又实在有限，几样冷拼热炒最后还是剩了不少。然后，另有同好请我们去了城区一间装饰极典雅的五福茶馆，本来想选台湾的文山包种，茶婆推荐了一款乌龙的秋茶，茶叶换过了三次，回到宾馆夜已经深了。同事打开电视。我只知道今天上午连方瑀和她的四个子女要与董建华在上海参加一艘新船的命名典礼，船东是董特首的妹夫，公司更是董特首的父亲一手创办，因为命名为“中华和平”，所以就散发出许多政治的味道。明天一早还要继续北行，同事让我先洗，我去卫生间简单冲了一回，然后服了一片帮助睡觉的氯硝西泮。北路的朔州虽然时值酷暑依旧夜凉，沉沉地睡了，居然一夜无梦。

同一天，广东汕头华南宾馆发生大火，造成31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女孩，后来又有报道这些女孩与色情有关。一南一北，一火一水，水火无情。

6月11日，星期六，阴历五月初五，入梅。想是江淮应该又进入梅雨季节，其实今年又是迟梅，江淮一带酷暑少雨。这一天依照风俗是要吃粽子。吃过早饭离开朔州，走高速路，一个多小时便去了雁北的大同。中午在大同吃午饭，有一款干烧鱼尾不错，据说用的是真正的鲩鱼尾，只是时逢端午没有粽子。粽子总是江南人的勾当，雁北酷地土地重碱又十年九旱，本地没有苇叶，更没有竹叶，包不得粽子，每逢端午当地人会用粘

小米做一种黄糕，聊胜于无。饭后已经两点多钟，即离开大同，本想傍晚前走太原外环的高速公路赶到阳泉，因为汽车的水箱爆裂不能行驶，叫了太原汽修厂的拖车，晚上十点才将车和人一起拖回太原，回到家已经深夜，明天一早机关另外派车仍去阳泉，抓紧睡了，在家我只需服用四分之一片的氯硝西泮。凌晨，国青队 2 比 1 战胜土耳其。

12 日上午先去了晋中的榆次，接着赶到阳泉，然后在阳泉的海外海吃午饭，因为叫了无醇啤酒，就应景喝了几杯。傍晚回到家，上网才看到有关沙兰镇的报道，事发已经三天，陈至立去了。这时，沙兰中心小学学生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 87 人。看着几张事发当天的现场照片觉得有些困惑，近景的一座屋顶上满盖着防水油毡，为了防风油毡上压了一道道红砖，这样的房子都没有被洪水冲垮，远处的校舍似乎也没有被冲毁的痕迹，怎么就会死了那么多孩子？接到舅妈的电话，说小玉从广东回来，广东那边已经给她开出了商调函，她回来办手续，让我们明天过去吃饭。小玉是我的表弟媳妇，表弟前年先调到广东去了，孩子也随着去了，一家三口只是媳妇的手续一直办不过去，又不想脱离了体制，还想走体制内人事关系的正式调动，也用了不少心思，终于有了结果。

13 日星期一，起床后即开机上网。每天早上，我的习惯是先看香港太阳报的时事报道，香港太阳报的网路放行，阅读网页也不用注册，界面设计明白清楚，说起来是张小报，我倒是每天必看。太阳报称官方媒体昨晚公布，已有 92 人死亡，其中小学生 88 人，另有 17人失踪。双休日没有休息，山西北路中路跑了一趟，星期一照旧上班，记得办公室里没人议论沙兰镇的事情，各忙各的，星期一的事情总是多。下午下班去了舅舅家，小玉心情很坏，单位领导不给她方便，放出重话，要走就辞职。我劝了她几句，总之还是那两句老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领导早晚同意放她走。舅妈迷上了电视连续剧《军人机密》，看得兴致勃勃。小玉心情不好，没吃晚饭，同事来看她，两个人躲进睡房，闭了门说话。大概是因为儿媳妇回来，我看饭桌上有一瓶刚开的瓷瓶口子酒，我陪着舅舅喝了一盅。因为姥爷的政治历史曾给舅舅带来极大的困扰，他长期以来对我所谓的人文热情就怀有一份极深的忧虑，绝不爱听我议论时政，所以我也知趣闭口不说。我就说小玉的事情他还得想些办法，他说能想的办法他已经都想了。 10 点多钟回家上网看到有报道 6月 11 日河北省定州南部绳油村因为土地纠纷，农民受到不名身份暴徒的袭击，至少造成 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住院治疗。黑龙江省省长张左因宁安沙兰的事件表示要请示中央处分。后来网上有人讲张左的请示程序不对，省长是省人大选举产生，张左应该向黑龙江省人大请示处分。其实张左的反应是真实的，他明白他这个省长是打哪儿来的，党管干部这是党的政策。

14 日看见了遇难孩子在墙上留下最后手印，不忍看。牡丹江市秘书长王同堂证实，沙兰镇派出所所长李作玉和沙兰镇党委书记黄明君已被拘留，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据说事发时，位于沙兰河上游的和胜村村主任和村支书曾经给镇政府和派出所打电话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警，镇政府无人接听，派出所回答正在办案无暇顾及。气象部门解释 6 月 10 日发生在宁安沙兰的洪水是属于两百年不遇的气象灾难。沙兰镇过去就叫沙兰坑，几乎是逢雨必淹的洼地，洪水常常会闹出些事情，但似乎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大的险情。所以 10 日下午 1 点多钟住在沙兰镇河边的刘艳梅接到住在上游 12 里公公打来的电话，说：“上面发水了，赶紧收拾吧！”刘艳梅放下电话，看了看外面的天，只听有雷，一滴雨也没有，她居然连熟睡的孩子都没有叫醒，漫不经心地让孩子继续甜甜地睡下去，继续手里的活计，根本就没当回事。二三十分钟后，电闪雷鸣，大雨瓢泼，刘艳梅隔着窗户看见水一下子进了院子，就慌了，拉起孩子，赶紧给弟弟拨通了电话，说：“院子进水了，快过来帮一把。”等她抱起孩子想出门的时候，门已经推不开了，顶着门的泥水开始涌进来。沙兰当地人都如此麻痹，可见沙兰人对这年复一年洪水的漠然。这样似乎可以想像派出所接到和胜村的报警以后如何反应。但是，沙兰镇的黄书记如果能有灵异的第六感应，他肯定会留在镇上耐心等着这个两百年不遇的建功立业的机会。我在山西贫困山区扶贫一年，也认识了几个乡镇书记，知道在一个县里熬一个乡镇领导有多不容易，不要说摆在京城，就是摆在省城不过是个科级干部，可是在县里就是局一级的大员。自然乡镇也有肥有瘦，我没有去过牡丹江，查看地图，感觉沙兰的条件可能比不上牡丹江沿江的东京城、石岩、兰岗，再瘦也是黄书记一家老小安身立命之本。或许他年近半百，在宁安辛辛苦苦熬了大半辈子，转过了几个乡镇，从小干事做起，一步一个台阶，心里也明白人大副主任难度大些，整好了闹个政协副主席啥的，再上个半格，副县级，就算善终，可以颐养天年。或许他年纪轻轻三十岁出点儿头儿，沙兰不过是他漫漫仕途中起跑过程中的一小步而已，将来的路还很远很长。可是 6月 10 日偏偏是个星期五，第二天就是双休日，正逢五月端午，虽然不如八月十五，大小也还是个传统民俗节日，也算体恤下情，上午各自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处理，下午留下王庆涛一人值班，大伙儿就放了羊。现在乡镇领导的家属跟着走的已经几乎绝迹，无论是子女教育，还是老婆的工作安排，生活的文明程度，再加上职务的调动，这些干部的家肯定都在城里，宁安离牡丹江市区不过几十里，交通便捷，在牡丹江市区弄一处水景的宅子，一个有点儿办法的干部把家安在牡丹江想着也不是什么难事。于是黄书记走了，走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这一走，一场两百年不遇的暴雨要让他后悔一辈子。凌晨国青再赢乌克兰，提前晋级。

15 日沙兰遇难人数已经确认为 99 名，另有 10 学生失踪。机关上午开了个小会，交待我联系接待兄弟省的一个采风团，傍晚和老婆去国美看空调，想在卧室里安一个壁挂式的，今年夏天热得早。晚上给小玉打电话，她的事情仍然没有进展，心情很坏。

16 日沙兰遇难学生人数升至 97 人，有人出来质疑遇难小学生最后手印照片的真实性，引发争论。上午旅游公司的人过来谈采风团行程的安排细节，然后头儿叫我过去说有人要去青藏铁路采访的事，让我落实。 11 点钟我出去跟老婆一块儿去了苏宁，还是看

空调，壁挂机便宜的一千二三，贵的四五千的也有。

17 日沙兰洪灾现场又发现了 3 具遇难学生遗体，失踪学生由 6 人减少到 3 人，死亡人数上升至 106 人，其中学生 102 人。上午印刷厂的长生过来把二校的样子拿走。天气极热，但决定今年不买空调了，姐姐的儿子今年本科毕业，想上香港理工大学在他们学校办的服装策划与营销文学硕士班，学时一年半，学费 6 万 6 千，他四年本科已经花了姐姐近 10 万块，这又要 6 万 6 千，姐姐和姐夫都已退休，两个人退休金合在一起不到两千，姐夫现在跑到几百里之外的地方打工，一个月能挣八百，不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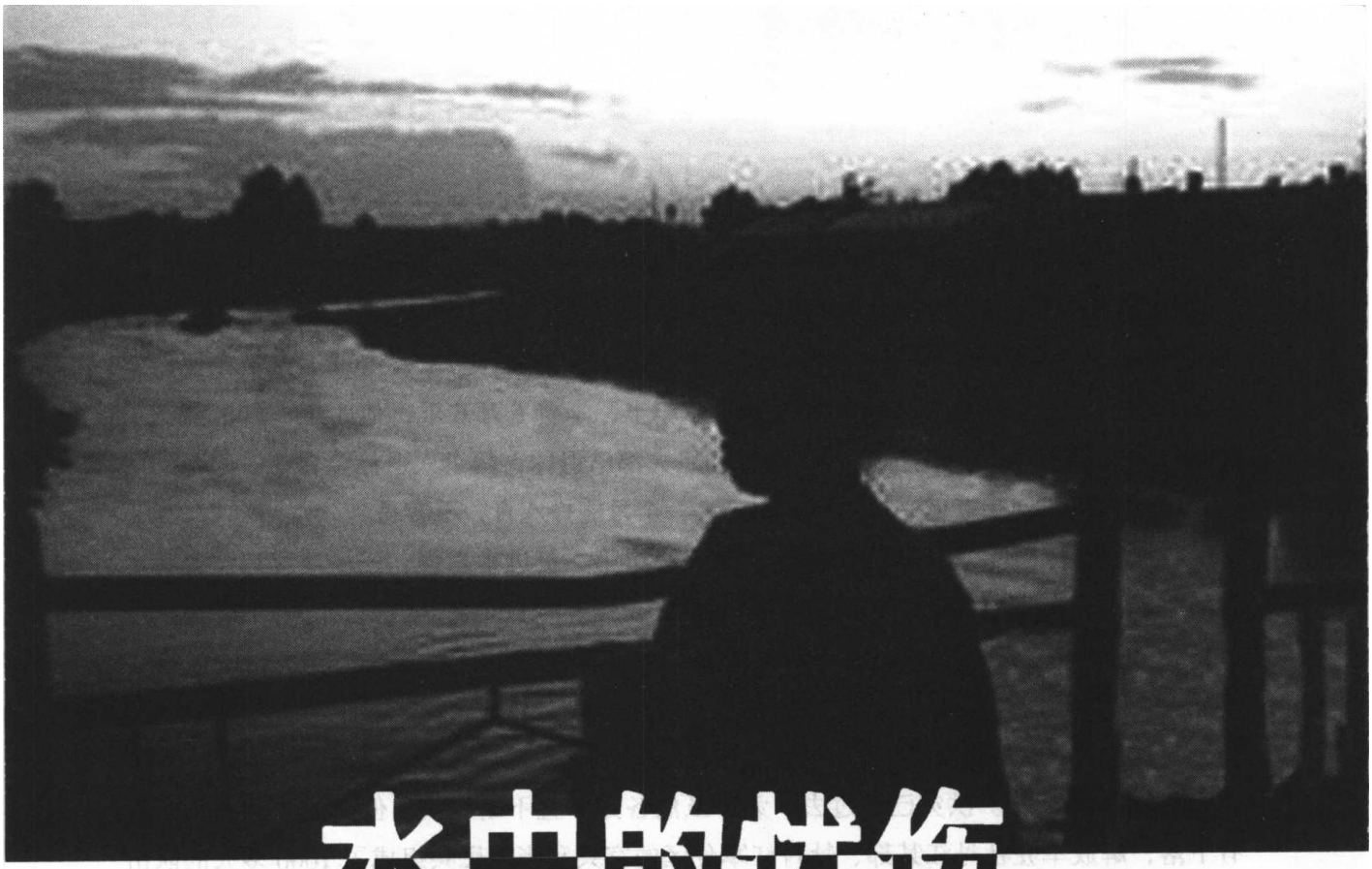
18 日凌晨，国青队 4 比 1 大胜巴拿马，小组第一挺进十六强，三场球我都没有看。沙兰失踪学生的搜寻没有新的消息，网上沙兰镇洪灾的后续报道也不少。下午老婆去医院探视一个因患抑郁症住院的中学同学，回来絮絮叨叨地讲了许多她们年少时的故事。晚上接赵英电话，嫂子那边要装修房子，外甥计划秋天结婚，就是现在动工时间也不宽裕。我说让岳母到我这儿住。

19 日，星期日。洪灾已经过去 9 天，虽然各方一直不断寻找，但部分失踪者仍然没有下落，解放军驻牡丹江某部、牡丹江军分区的官兵和当地民兵组成了 1000 多人的队伍对失踪者展开大搜寻，搜寻范围从沙兰镇中心小学向下至宁安市石岩镇河段，全长约 70 公里。上午去了嫂子那边，帮着收拾东西，把细软打包搬到楼上邻居家的空房子，大件家具已经请了搬家公司，给装修腾房子，整整忙了一天，晚上岳母和我们一起回来。

20 日，事发 10 天以后，失踪学生的遗体全部找到，搜寻失踪学生的工作就此结束，至此死亡学生 105 人，村民 4 人。我居然想到了很早以前读过的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关于莱辛的一段文字，莱辛的妻子死于产后，孩子出生不久便夭折，莱辛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他多懂事！多懂事！你不要以为我有了孩子才不过短短的几个钟头就已经变成了溺爱不明的父亲！我清楚我在说些什么——他要人们用铁钳把他拉到世界上来，这难道不是懂事吗？他立刻便察觉到世路的艰难，这难道不是懂事吗？——他抓住第一个机会就逃回去了，这难道不是懂事吗？”接到小玉的电话，她已经飞回广东，手续已经拿到了，虽然有些曲折，也还算顺利。

6 月 21 日，沙兰洪灾现场救灾指挥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此次宁安沙兰镇洪灾死亡人数最终确定为 117 人，其中学生为 105 人。临近中午，位于太原北郊的山西江阳兴安民爆器材有限公司因天气炎热高温，引起 604 号仓库存放的太原市公安局收缴的私制炸药自燃爆炸，自燃发生初期被现场职工及时发现，迅速撤离，爆炸波及周边 27 个村庄、6 所学校，共有 336 人受伤，其中 174 人分别在 8 家医院住院治疗，6 人伤势较重。是夜，中青队 2 比 3 不敌德国，告别荷兰。

作者简历：祝大同，作家、编辑，供职于山西省作家协会。现居山西太原。



水中的忧伤

陈　毓

“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发生洪灾，92个孩子洪水中遇难。”

得知这条消息是源于我的同事杨大枣的早间读报。

每天早上在办公桌前坐定，杨大枣的第一件事就把当天的报纸揽到面前读。他通读报纸上的标题，五六份报纸读过一遍，一个早上就差不多完了。

久了，大家也习惯了他的朗读，一边各自做自己的事，一边有一耳朵没一耳朵地听，倒也不担心世上发生了大事而你独自在无知的暗处。

这个早上，在读完那个题目之后杨大枣沉寂了，他的异样使众同事集体抬头，然后就看见大枣的眼睛张得很大，脸涨得通红，片刻后他把报纸连同手掌劈向桌子，一个在大枣嘴里鲜见的词被大枣恶狠狠地骂出了嘴：“王八蛋！”

两分钟后，那条新闻被我们细细读过。半小时后我们得知，大枣念出的那条消息距离事发当天已经两天过去，而且死亡孩子的人数远远大于那个数字。报上有一张一个老人抱着孙儿幼小尸体的特写照片，那双空洞的眼睛让我今生难忘。

我的一个朋友说，她很畏怯的一件事就是去医院看望生病的亲友。她说那比她自己生病还要叫她难受。如果她探望的人胃有病，回家来她自己会胃疼得吃不下东西，如果探视的人患有眼疾，回来的路上她就眼睛肿胀视线模糊了。

我相信她说的一切不是虚妄。对于灾难，我有本能的拒斥和畏怯，我的直觉反应是我不想看到、不想听到，灾难的阴影会让我的心里有阴影，我会像我的朋友一样敏感、犹疑、质疑，最后我也会像她一样患眼疾、害心绞痛。但是，当灾难真实发生在我的同类身上时，甚至罹患在我们要倾力保护的孩子身上时，我只能像大枣那样愤怒却又无处泄愤、哀伤却又无从哀伤：那些花儿，那些如花的孩子，他们的人生尚未真正开始。

这一天，大枣比以往更早的去接儿子，城市禁止摩托车入城，大枣早上上班来只得把摩托车寄放城外，晚上下班先绕道城外，再骑上自己的车去接放学的儿子。有爱牵着，大枣甘于麻烦。

到了 8 月，我的女儿就 11 岁了，过了暑假，她就是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

这样急急推算的方法是我女儿式的，对于成长，她总是踮着脚尖看到前面去。

上周，学校组织他们去一个军事基地训练一周。提前两天她就开始念叨，问我她离家的这一星期我会不会因为想她而睡不着觉。怕我反对她去，曲折地巴结我，告诉我去的种种好处。周五放学回家，手上拿着一大张纸的清单：是出行要带的东西，我笑着问她，干脆把妈也打包带走算了？她很认真地看我，说，老师让学生练自立。我想了三分钟也没想明白她话里的意思。第二天下楼也不让我送，急急跑下楼又匆匆回返，说是忘了拥抱妈妈告别，因为离家的日子要一个星期呢。

我想女儿不在家的夜晚我尽可以让日子简单，我不像往常那样费时费力地做晚饭，第一天这样过去。第二天当我独自坐在餐桌前的时候我忽然心慌，我不知道我教给她的，在没有清洁剂可用的时候洗干净自己饭盒的方法她用了没有，我担心不干净的饭盒再次使用会不会叫她肚子痛。忍到第三天的傍晚我给她的老师打电话，电话里老师说你放心吧，孩子刚训练完在那边休息呢，肯定没有在家里好，孩子不习惯也很正常，不要紧，不要紧。我很想从老师的电话里听见女儿的声音，哪怕是一群孩子戏闹的声音，但是听不见。我就想：管得挺严的呵。

一周后女儿回来，小脸儿黑黑，明显瘦了，却像忽然蹿高了一节，叫我吃惊。她却说她的床高了，妈妈做的饭菜叫她的肚子饱了，嘴巴却饱不了。小嘴不停，忙里偷闲地说些训练的事情：一碗菜汤里打捞上四只苍蝇，水煮蛋里剥出小鸡，午睡时不敢说话，说话的人会被喊到楼道罚站军姿，日记里不能写不好的话，教官每晚要看，还要拍教官马屁……

从下午到晚上，我走到哪里，她跟到哪儿，尾巴似的。天没黑就问晚上她可不可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跟我睡？脸上的热切不忍拒绝，等得到她满意的回答立即欢呼一声，自己抱来她的枕头被子，放在我的床上，那是她回家的夜晚想要的全部幸福。

睡着前她还不忘叮嘱我，我那件袖口缀有蕾丝花边的衣裳要是明年穿着小了，就送给她。在她的想象里，我会跟她一样转眼长高，明年穿着今年的衣裳就嫌短的。

在老家我母亲那里，女儿的成长确是以刻度记的。在我母亲卧室的门框上，一道道刻下的，是女儿从三岁到九岁的身高记录，她们每见一次面，门上的刻痕会多出一道。而女儿，每次回老家，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拉着外婆的手奔向那道门。她们通力合作，快乐认真，好像她们做着的，是世界上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我知道，那道道刻痕，之于她外婆，是别后的回想，是可以实在映现眼前的细节，从两岁被她带到八岁的女儿已经成为母亲老年生活回想的一部分，女儿不在眼前的日子，她会觉得眼前空寂。她们相逢的时候笑语喧哗，分别时总是泪水涟涟。

而今夜，我所能做到的，就是不等女儿来求，我就把她的小枕头抱到我的床上，并在心里说，妈妈今夜不写字，只陪你睡觉，再给你讲一个你爱听的故事。

听父亲讲，我在 5 岁时就能像鱼一样自在游泳，我的才能来自父亲近似于斯巴达克式的严酷训练。

老家的门前有一条滔滔大河，每到汛期，站在高高的山岗上也能听见河水巨大的咆哮声，那样的夜晚连一向聒噪不休的青蛙也不叫了，睡在隔壁的爷爷不时就会“啊呀”一声：“哪里垮憋子了？”那样的夜晚，别说大人，连小孩的睡也是半梦半醒的。

河水阻隔了此岸和彼岸的往来，学校在河对岸。水势过于凶猛连村里最好的水把式也觉得发烦的时候，我们就会心安理得地站在河的这岸遥望我们的学校。那时水把式就会看天，看我们头顶的天，再看上游的天，然后说，再过一个时辰吧。

这样的天气过河上学就像一个仪式，水性最好长得高大威猛的男人走在上水位，孩子们按个子的大小依次排定，最大的那个孩子的手被水把式紧紧拉着，次大的孩子被大孩子拉着，大孩子拉着小孩子，环环相扣……这样的队伍也不能太长，担心首尾不能相顾。在水边站定，水把式嘱咐：任何时候都不能松开对方的手；不要看水面，要看对岸；换脚时不许高抬脚，要蹭着河底走；站下水位的要跟上水位的保持平行；书包背身后、背紧。记住了没？记住了。我们小声答，手心直冒汗。再回头看



目送我们过河的家人，早都站满堤岸，不敢大声说话，怕惊了什么似的。

在这样的情景里，我的远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决心要让他的女儿游泳游得像鱼一样好。父亲用他极端的方式练就他女儿的能耐：在暴烈的艳阳下，把他女儿的头一次次按到水里，学不会憋气？学不会换气？那就不许出来。父亲说，你会水了我就不那么担心。

对我的女儿，我也须像她的外公当年对她妈妈那样做吗？教会她游泳，游得像鱼一样好？我不知道。当你觉得可以依靠的保障其实脆弱得不堪一击时，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应当教会我们的孩子什么。

就算我能教会我的孩子一出生就学会游泳的本领，大概还得再教她懂得避火术、遁身术，遇到阻隔时及时在身后长出可以带她暂时飞到天上的翅膀……这样的功夫，哪里求得啊？

此刻，我觉得了想象的无力。

“是我走的时候了，妈妈，我走了。

当清寂的黎明，你在暗中伸出手臂，要抱你睡在床上的孩子时，我要说道：‘孩子不在那儿呀！’ ——妈妈，我走了。

我要变成一股清风抚摸着你。我要变成水的涟漪，当你沐浴时，把你吻了又吻。

大风之夜，当雨点在树叶中淅沥时，你在床上，会听见我的微语，当电光从开着的窗户闪进你的屋里时，我的笑声也携着它一同闪进来。

如果你醒着躺在床上，想你的孩子到深夜，我便要从星空向你唱道：‘睡呀，妈妈，睡呀。’

我要坐在各处游荡的月光上，偷偷地来到你的床上，乘你睡着时，躺在你的胸上。

我要变成一个梦儿，从你的眼皮的微缝中，钻到你睡眠的深处，当你醒来吃惊地四望时，我便如闪耀的萤火似的熠熠地向暗中飞去了……”

这首《告别》是泰戈尔写于 92年前的诗篇，收录在他的 《新月集》里，那是他献给全世界儿童的诗篇。在诗人眼里，那些天真的、芬芳的、有着精灵一般智慧和淘气的孩子就是天上一轮熠熠生辉的新月。

我把它抄录在此，愿它为花，开满百多座小小的坟茔，愿睡在那里的孩子不孤单；

愿它为柔软的绒布，擦掉伤心母亲脸上滚滚的泪滴。

作者简历：陈毓，女，作家。 1996 年开始文学写作，供职于陕西某杂志社。现居西安。

以“国家”的名义

葛兆光

读历史书，书上总是说唐帝国多么大方和自由，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总是很留恋那个自己很酷、很阔的时代。那个时代的自信和骄傲，使唐人觉得中国就是整个“天下”，多少有些不把四夷放在心上，把自己的家门大敞开着，还说这是“海纳百川”。一千二三百年前，日本使臣和僧侣到中国来，除了好吃好喝好招待之外，临行时总是送一堆书，儒经也有，佛典也有，连那些不那么能登大雅之堂的《游仙窟》甚至《素女经》、《玉房秘诀》，也随便他们抄回去，并不觉得这就被偷窥了国家机密，也不觉得这就丢了上国斯文，倒总觉得这是“以夏变夷”。只有一回例外，就是在吐蕃日益强大，弄得唐帝国寝不安席的时候，于休烈上过一份奏折，叫《请不赐吐蕃书籍疏》，但是，好像也没有下文，该送的照样送，大包小包，看看日本人自己编的《将来书目》，就知道这种“文化馈赠”在唐代是多么大方。

大方的背后是富强，自由的基础是自信，到了帝国外面突然出现敌国外患的时候，汉唐以来中国人那种睥睨万国的心理就开始悄然变化，特别是在“八尺卧榻变成三尺行军床”的宋代，尽管口头上不说，心里却总是有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那个诗写得很好的张耒就说过，“为今中国之患者，西北二虏也……君臣不以挂于口而虑于心者，数十年矣”，数十年的阴影笼罩下，让过去的自信和大方，统统变成了谨慎和紧张，只是口头不肯多说，害怕一言成谶。

这个时候，有人意识到书籍不能大方地送人了，知识不能随便外传了。理由呢？据说是为了“国家”的安危和尊严。

最早是至和二年(1055)，有名的欧阳修在《论雕印文字札子》中，相当郑重地请求朝廷下令，禁止雕印有关文字，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怕

传到北方的辽国。据说，当时汴梁有人刻印了宋人的文字，“多是当今论议时政之言”，里面有很多朝廷的内部消息，欧阳修说“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另外呢？据说有的文字不那么高雅，说是怕“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编集，有误学徒”，实际上是怕北方的辽人小看了大宋，丢了国家的体面。欧阳修的建议结果如何？我没有考察。表面看来，理由相当正当，事关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体面，不能不小心。几十年以后，元祐四年（1089），也算是他的学生吧，那个有名的苏辙出使了一趟北方，就在《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里说，我们大宋的民间印刷品，“北界无所不有”，其中“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图，印行戏亵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漏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意思和欧阳修的差不多，大概是应他的呼吁，第二年也就是元祐五年(1090)，礼部就下了禁令，“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于是，唐代的宏放和自由，在事关安危的背景下换成了小心翼翼，天朝的大方和豪气，在不太自信的心境中变成了惴惴不安。

小心翼翼也罢，惴惴不安也罢，当国家毕竟还是同一秩序下的生活空间时，这种小心和不安都很有理。不过，道理一旦越界，事情马上就变了味道，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安危和尊严出的主意，反过来却授政府以柄来钳制言论。他们也许没有想到，以“国家”的名义可以堂堂皇皇，也照样可以夹带私货，特别是怀有某种不良意图的执政者越俎代庖，把这种正当行为延伸到了文化领域的时候。就在这份元祐五年（1090)的礼部令中，借着对敌国的担心，执政者便暗渡陈仓，顺手就控制了本国的知识和思想空间，禁令中说，不仅“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就连“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评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而且“候印讫，送秘书省”，这口气，这腔调，让人想起马克思所说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官。

事情一旦开了头，就沿着惯性往下走，接下来，皇帝伪装成政府，政府替代了国家。北宋的大观二年（1108），由于各地书商生意红火，有个负责淮南西路教育的官员叫苏棫的，就建议把印刷权力收归国子监，不要让民间的书商自己印诸子百家的书，免得“晚进小生，以为时之所尚，争售编诵，以备文场剽窃之用，不复深究义理之归”。到了政和四年（1114)，一个叫黄潜善的人，也乘机大讲时文的坏话，把他们自己用

来考试的时文和导致考生死背教条的毛病，都算在了出版商的身上，说因为读了书商的东西，他们的学问“读之则似是，究之则不根”。三年以后(1117)，又有人就引用控制印刷的禁令，觉得读书人现在讲话写文“不根义理”，就是读了“编题”、“类要”之类的出版物，所以建议“禁绝书肆私购程文镂板市利”。

想想最可悲的是，本来是士人的建议，最后钳制的是士人自己。以“国家”的名义，政府有了对思想控制的合法权力，于是，关于出版的钳制就越来越严厉。举两个南宋的例子，一个是对于自由思想的控制，庆元二年(1196)，国子监建议，读书人要以《语》、《孟》为师，不能传习语录，应当禁止这些语录出版，免得这些“欺世盗名”的理学家思想坏了人心，所以要把《七先生奥论》之类的书统统销毁。一个是对政治新闻的管制，像南宋绍熙四年（1193)，朝廷下令销毁各种小报，因为它“始自都下，传之四方”，把各种本来只让官方知道的消息，像章疏、封事、程文，甚至“官员陈乞未曾实行之事，先传于外”，搞得民间的小报比官方的朝报还受欢迎，因此朝廷只好下令销毁，把新闻大权统统收归自己，规定只有官方朝报才可以报道消息。

其实，辽和金从两宋的印刷品中，未必能刺探到多少军情政事，只是在这种小心、不安、紧张和焦虑中，不仅仅文化气象上唐人的大方，生活世界中唐人的自由，渐渐换成了宋人的拘谨和专制，而新闻、出版和言论的自由,在宋代也被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合法地取消了一大半。

（《历史学家茶座》第 1辑，王兆成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



晚清时山西大学堂学生在教师监督下考试

考试之误国

半　夏

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神甫曾说，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一个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统治的。

这里所说的全国，自然指的是利神甫当时亲历的中国。不过，利神甫的话会让今天的人读来有些糊涂，也就是所谓统治国家的哲学家云云。这却是利神甫作为一个虽然博学却终竟蛮夷的外人角度直接导致的。

利神甫指认的哲学领域，当然就是科举考试。并且，利神甫还十分对位的将科举考试的等级出身，用西方人认同的学位表示：秀才相当于学士，举人相当于硕士，进士相当于博士。这样的类比，果然形神兼备，也让习惯于用本土的今天诠释古代和异域的人，感到十分的亲切。拿了丈人钱财到欧洲懒散的方鸿渐，被丈人逼宫取博士学位当回报的契据，其振振之辞云：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宜举洋进士，庶几克绍其裘，后来居上，愚亦与有荣焉。孝廉公对仗洋进士，虽然有合掌的八病嫌疑，可你得承认，这位在上海开铁铺子发了财的点金银行经理，倒和几百年前的洋和尚，有息息绵绵

的勾通呢，所以无可辩驳的让鸿渐用 40美金从爱尔兰人手里赚来了被称为和清华大学齐名的克莱登博士文凭。

当然，得承认，用学士对等秀才，在今人的眼光里，会觉得略略降格，而相关的，举人之于硕士，又不免打进了若干水分。老话里讲了，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中国人的心位置正中，西洋人的心位置偏左……利神甫果然是让中国人大开眼界明白地球和地图的人，至于前述对位的比照是否因为了他的心脏偏左，就不得而知了。

撇开这些而言，利神甫的立论自有他的道理，因为作为科举考试出题题库的四书五经，正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作。其实，让利神甫感到奇怪的，并非四书五经的哲学意义与否，而是仅仅凭借对这几部哲学著作的熟悉，就可以掌握对国家权利的捭阖，按照利神甫自己的说法就是，委派即便是最有势力的大臣的根据，主要是候选人所写文章的好坏。

这种奇怪，在利神甫本人，倒并没有得出什么惊世骇俗的结论，反倒有善良温和的解释：从帝国建立以来，人们就更愿意学习文科而不愿从事武职，这对一个很少或没有兴趣扩张版图的民族是更合适的。不过，这解释让敏感的人听了，也不能保证就不会生发积贫积弱祸由此出的感慨。

按照历史教科书的训教，欧洲思想正式跟中国接触，是在明朝中叶以后，所以天主教徒常说那时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不过按照那位方博士从线装书里趸来的论断，明朝天主教士带来的科学现在早过时了，他们带来的宗教从来没有合时过。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

这样的结论虽然有实证主义的嫌疑，但的的确确是心脏位置没有偏颇的中国人说的。所谓传教士带来的科学过时云云，倒是值得商榷，因为即便到了戊戌维新的时候，中国必须占据地球中央的理念，仍然不可撼动，倒是本土的传统，可以存续几个世纪而照旧顽固，譬如科举。

从进化的角度讲，相对魏晋以降的九品官人法而言，隋唐开辟的取士制度，自然是一种进步，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点评，用非我族类的异己眼光，阻断了平民致身通显的路数。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科举的目的，在于选拔统治人才，但它所提倡的读书方式，却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固然表征了读书的某些重要，但读书的目的，却也同时发生了狭窄性的偏斜。生物界的某些进化，同时也是退化。说这话的老前辈，真的具有预见性。

无论什么人，只有通过读书，考过了科举的四六级，就可以做官，这当然体现了考

试制度的某些优点，但也同时印证了考试的流弊。

周作人在讨论中国的国民思想时认为，正是这种考试制度，使得本来很平常很健全的中国思想，生出了毛病。为避剿袭嫌疑，以下不妨抄录原话：

> 考试制度最大的流弊的两点：第一，因为作文章不肯说真话，完全是说谎。我们平常作文学的文章，自己照自己的思想去作，今天心里高兴，写出来的文章，就是高兴，今天有悲伤的事情，写出来的文章就是悲痛的，但是考试的文章却不能如此，虽然我有很悲痛的事情，在考场上出了庆贺皇太后八十大寿的题目，就非得作颂扬的文章不可，因此千余年来，中国人作文章的本领很好，一般外国人，特别是友邦人，说中国人的宣传本领很好，这就是由于千年来学成的遵命文学的缘故。人家说杯子是圆的，我就作一篇杯子是圆的文章，人家说杯子是方的，我就作一篇杯子是方的文章，就是有人说这不是杯子，我也照样可以作一篇文章，于是文章完全依据题目去作了。我们从前学作论文，先生就是这样教，若不这样做，文章就作不好。但这种文章，决不是自己的文章，完全是替题目说话，弊病很大。第二，是胡说八道。从前在书房里作什么《汉高祖论》、《管仲论》，谈论一二千年以前的事情，汉高祖怎样与匈奴作战，我们完全不知道，怎样作论文呢？结果只好乱说了。如果向来大家都说汉高祖如何的好，你能翻案，说他如何不好，这便是更好的文章了。有了这样的好文章，一旦考中，点了翰林，做了御史，就更可胡说八道了。从前汉高祖打匈奴都可批评，都可以骂，何况是现代的人？因为有考试，所以要作文章，因为作文章，所以不说真话，胡说八道，这种习性养成之后，于是把中国的国民性弄坏了。中国儒教的思想，原来并不是如此，孔子对子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才是真实的知道，可是因为考试制度，把这点精神完全丧失了，变成说谎同胡说八道，因此只在文章上讲空论，真实的学问一齐都不发达了，科学也因此不能发达了。
>
> 《中国的国民思想》

周作人的话，按照他的逻辑，实在是说考试之害人乃至误国，这样醒目的立论，不能说都对，但也的确不能说他说的不对。利神甫也曾提到，“在这个国家有一条从古代帝王传下来并为许多世纪的习俗所肯定的法律，规定凡希望成为或被认为是学者的人，都必须从这几部书里导引出自己的基本学说。除此以外，他遵循这几部书的一般内容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